# 地方化与全球化: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以成都高新区为例*[1]

杨永春 李建新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从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复合视角，以成都高新区为例，对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路径进行梳理。从1990年代至2005年前后，成都高新区大体处于以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为主要能动主体的地方化阶段，当地政府从行政区划、管理权、土地转换、园区规划等方面展开充分的制度设计，为地方化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进而实现了年均达25%的经济快速发展。2005年前后，随着具有产业引领能力的旗舰跨国企业的入驻，成都高新区加速融入全球生产及市场体系，进入全球化阶段。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典型，跨国企业为核心的领导型企业结构在制造分工环节获得了成功，经济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一阶段。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使得成都高新区面临再次转型的困境，地方政府主导开启的“三次创业”以及园区的新城转型体现了制度回归的重要性。

**【关键词】**:地方化;全球化;西部;发展模式;成都高新区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579(2017)01－0113－12

区域发展的模式与路径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不同尺度分析了东欧模式[1]、拉美模式[2]、印度模式[3]、意大利模式[4]等典型发展模式。从我国区域发展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度设计和区域开发路径的空间梯度差，率先激发了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可变性。自费孝通先生较早在1983年提出苏南模式[5](p53－74)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浦东模式等经典的地区发展模式陆续被发现、提出[6－7]，并在不断变幻的时空环境下被反复论证。

已有对区域发展模式及路径的研究既有基于相对宏观的区域、城市尺度也有基于相对微观的工业区、开发区尺度。早期主要是强调系列地方化力量的作用，西方学者关注点集中在专业化经济、集聚经济以及地方作用集合体，包括地方企业与生产网络、地方学习与创新等方面[8－10]，而后地方制度以及大企业角色成为新的关注点[11－13]。国内则关注制度改革与变迁的作用，如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等分权式改革背景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形成和转型的重要因素[14－15]。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研究转而强调全球化力量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全球链接”会打破区域原有发展路径[16－18]，国内学者也认可全球化对区域发展的“机遇面”，如刘云刚认为边缘地区应从全球视野寻找地方定位，建立地方－全球联系，实现路径创造[19]。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认为打造“内源拉动”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双引擎”发展机制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20]。

[1]**收稿日期:**2016－11－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571155);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lzujbky－2016－269)

**作者简介:**杨永春(1969－)，男，陕西白水人，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与规划。

李建新(1990－)，男，江西东乡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空间规划。

就我国而言，开发区作为地方化/全球化作用的交汇点，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发生器[21]，也是承载各类发展模式的主要地域空间。当前针对我国高新区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全域层面的发展框架构建[22-23]、二次创业提升[24-25]、未来发展探讨[26]等方面，案例分布在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仍有三点值得思考:首先，地方化与全球化可为解读高新区的发展路径及模式提供一个完整的时序主线，但已有研究较少从该复合角度展开。其次，随着改革的时空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也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寻找到自身的全球分工定位，应当适时对中西部地区高新区给予关注。第三，在后金融危机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偶发性因素导致的区域发展脆弱性被充分暴露，在此情境下以政府为领导者的地方化力量如何应对也值得关注。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渐进制度改革进入攻坚阶段[27]，西部地区开始零星出现以各类国家级开发区为典型的国家政策的试点区，日益成长为驱动西部发展的增长极，如 1991 年作为首批 26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成都、重庆、西安高新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西部地区的高新区也开始摆脱原先封闭的发展体系，日益受到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这一变化为对其经济进行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以及现有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将以成都高新区为案例，从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复合视角来探讨西部典型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时序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以期对相关研究领域做相应补充。

##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1．1 研究区概况

成都高新区是 1991 年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初期选址于成都市南郊的一片农地，自成立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成为成都市最具活力的增长中心。目前，成都高新区由南部园区和西部园区组成(图 1)，南部园区定位为“现代服务中心、高端产业新城”，重点发展金融、商务、会展、研发、软件及服务外包等现代高端产业;西部园区定位为“业态完整的高科技工业发展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高科技制造业。截至 2014 年，该区土地面积 130 平方公里，总人口 87．87 万人(含流动人口)，产业增加值 1178．2 亿元，单位平方公里经济产出 9．06 亿元，是四川省的 155 倍、成都市的 11 倍，人均 GDP3．2 万美元[①2]，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作为科技部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六家试点单位之一，根据科技部的排名，2014 年成都高新区在全国 114 家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北京中关村、深圳高新区和武汉东湖高新区。

[2] ①此处及本文其他统计性数据主要直接引自或间接计算自《成都高新区地方志》及相应年份的《成都高新区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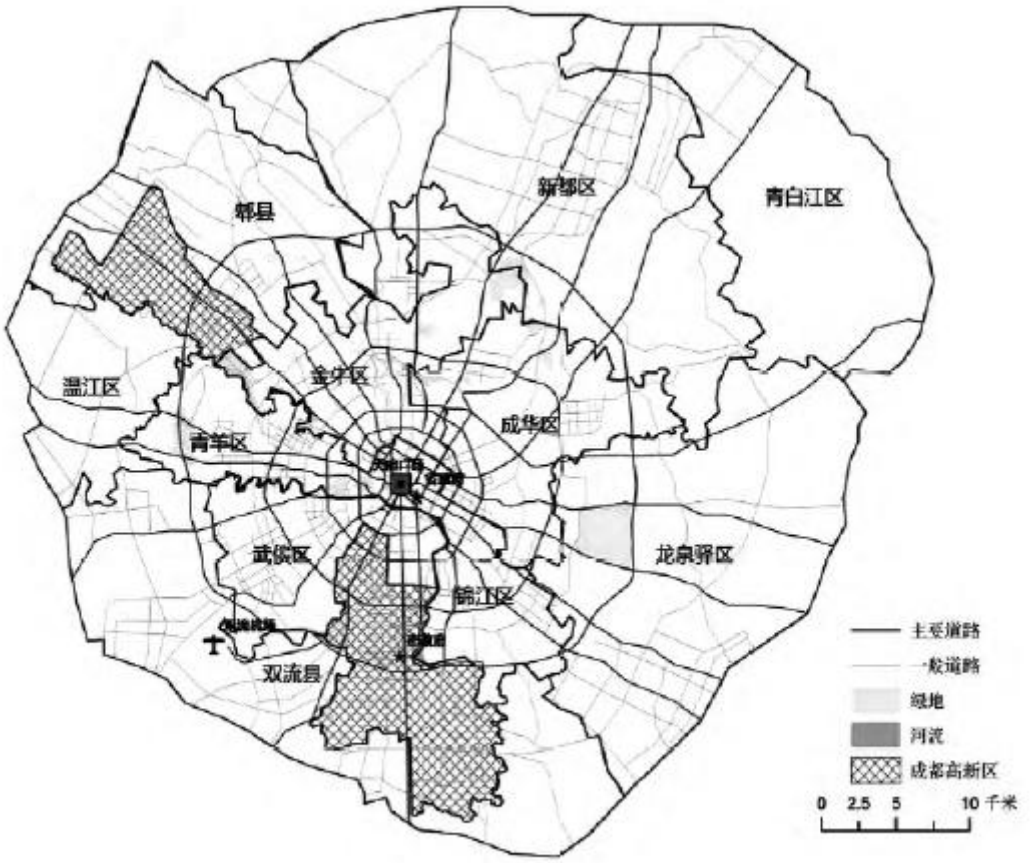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1．2 数据来源

为便于展开研究，笔者于 2015 年 12 月对成都高新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研。一方面获取了部分一手资料，包括政府文件、政策文本、产业报告、媒体资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从高新区管委会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获取了《成都高新区地方志》及 2007－2015 年的《成都高新区年鉴》，二者基本完整记录了成都高新区建区以来的发展轨迹，也很好地满足了统计性数据的需求。另一方面对高新区管委会内设的发展策划局、投资服务局、经贸发展局等部门以及部分代表性企业进行了走访，对部分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进行了深入访谈。

## 2 自上而下的地方化阶段:1990－2005 年

成都高新区“白手起家”于一片农田(位于成都市南郊的神仙树片区)。自 1990 年正式成立以来的大约 15 年，总体处在以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为主要能动主体的地方化阶段。当地政府主导下的制度设计为园区发展奠定了决定性基础，伴随着政府制度设计过程，园区通过大量内资项目的引进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在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演替、区域创新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整体上，地方化阶段政府主导下的制度设计因素作用重大，区域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特性。

2．1 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

199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西进”催生出成都高新区这一地方发展的“试验田”。未知的收益及风险使得当权部门在早期对其态度微妙:1990 年成立时政府赋予的开发面积为 2．5 平方公里，仅占市域面积的 0．02%，以及设立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开发

区管委会来推行“政府主导推进”的管理体制。

随着1991年获批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成都高新区成为国家顶级经济政策的践行者，也即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认可。其后，作为城市权力执掌者的省、市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干预，从地方层面展开充分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配合了园区的发展。伴随着渐进式的管理权让渡和区划调整，不断强化了园区的综合管理权限，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纵深空间。如1991年专门设立的高新区“省市共建六人领导小组”确立了“凡涉及省、市上的经济管理权利全部下放高新区管委会”的决议;成都市政府于1996－2003年先后对成都高新区进行了3次区划调整，将其面积由2．5平方公里增加到82．5平方公里，而区划调整中乡级行政单元的介入也让成都高新区由单纯的产业开发区转变为具有行政区职能的开发区。园区范围的扩大和管理权的综合化，实际上确立了其“地方行政主体”的地位。

另外，地方政府在初期阶段还进行了一系列核心制度设计，也对园区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如通过行政操控对园区土地利用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仅1988－1996年，利益主体相对单纯的耕地和未利用地大幅度压缩了23．26%和41%，而对应基础设施建设的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则分别增长了84%和90．03%。经济载体建设方面，1990－2005年通过调整、新建等方式共规划建设了10个设施完备、分工明确的工贸园区。招商引资方面，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制定了阶段性招商引资战略，1990－1995年注重项目数量的积累，累计引进项目数达494个，1996－2001年随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三大主导产业的形成，转而注重完善产业链，2002－2005年则以招大引强，升级产业链为目标。与此同时，成都市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先后出台了多达10余份文件(表1)，从税收、资金、土地等多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入驻企业给予丰厚的政策支持。

表1　1991－2005年成都高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 年份 | 发布机构 | 文件名称 | 优惠政策类型 |
|---|---|---|---|
| 1991 | 市政府 | 《成都高新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 | 资金、土地、信贷 |
| 1992 | 市政府 | 《关于鼓励外商在高新区投资的若干规定》 | 税收优惠 |
| 1992 | 管委会 | 《关于外来投资者和开发区内高新企业实施优惠待遇的补充暂行规定》 | 税收、资金、土地、信贷 |
| 1992 | 市政府 | 《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高新区工作的暂行规定》 | 创新创业 |
| 1992 | 管委会 | 《关于实施鼓励重大产业项目税收优惠的规定》 | 税收 |
| 1997 | 管委会 | 《成都高新区重点纳税企业奖励的办法》 | 企业奖励 |
| 2003 | 管委会 | 《关于实施产业用地优惠政策的办法》 | 土地 |
| 2004 | 管委会 | 《关于实施鼓励投资重大产业项目优惠政策的办法》 | 税收、土地 |
| 2004 | 管委会 | 《关于实施创新创业优惠政策的规定》 | 创新创业 |
| 2005 | 管委会 | 《关于实施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创业的扶持政策的规定》 | 创新创业 |

注:数据整理自《成都高新区地方志》,表2同。

2．2地方企业主导的内生经济发展

地方化阶段，政府制度设计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自1996年展开系统经济统计以来，成都高新区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1996年的189101万元增加至2005年的1409204万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5%。同时，内资企业占到绝对比重，截至2005年，成都高新区登记的1．08万户企业中内资企业占96．06%，因此该阶段成都高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本地企业为集聚主体的内向型新型产业空间。

2．2．1主导产业的形成与转型

地方化阶段，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先后经历了一次形成阶段和一次转型阶段。形成阶段发生在第一次区域范围调整之前的1990－1995年，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其策略为通过招商项目的“大推进”以解决“立区”矛盾。根据成都市政府《关于推进成都科技密集开发区建设》，当时共确立了新材料、光机电、生物、微电子和计算机应用、中成药开发、传感、激光、核技术应用、光纤通讯等九大重点产业领域。该阶段累计引进项目达494个，其中内资项目比重占绝对主导的70．04%，工业总产值由1990年的6651万元增加到1995年的36．9亿元，翻了55．48倍，并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优势产业。但该阶段产业体系庞杂、企业技术门槛低，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高新产业集群。

随着1996年区域范围调整，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体系随即开始转型，其策略为通过产业精简实现“高端突破”，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被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新的产业体系更为简洁且符合发展潮流，成都高新区通过“吸引、改造、淘汰、迁走”等方式，改变了过去杂而小的产业体系格局，不断向新的主导产业要求靠拢。随着产业氛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提升，园区吸引了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企业入驻，并开始零星出现跨国制造企业的分支机构。至2005年，成都高新区工业总产值达到62．67亿元，比1995年又翻了1．70倍，规模以上企业279家，世界500强和国际知名企业设立分公司28家，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制造三大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区的43．6%、29．6和7．6%，合计占80．8%。

2．2．2地方创新的深化

高新技术企业是成都高新区最重要的创新载体。自1991年开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以来，成都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表2)，由1991年的23个增加至2005年的812个，占全省比重常年保持在50%以上，占成都市60%以上。入选企业集中在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如2005年812家高新技术企业数中从事软件类企业86家、系统集成服务类企业95家、生物医药类企业150余家，三者比重合计超过40%。同时，由于创新门槛较低，该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多为具有专利的民企，仍存在规模偏小、创新能力偏低的问题，如2005年从事系统集成服务的95家企业中，规模较小的三级、四级企业达83家，从事生物医药类的150余家企业，也仅有25家通过GMP认证。

表2　1991－2005年成都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表

| 年份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
|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家) | 23 | 42 | 35 | 18 | 18 | 23 | 31 | 36 | 69 | 101 | 115 | 83 | 162 | 115 | 112 |
| 实有高新技术企业(家) | 23 | 65 | 116 | 134 | 152 | 175 | 206 | 242 | 272 | 378 | 493 | 524 | 605 | 700 | 812 |

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与当地政府部门采取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密切相关。一是通过优惠政策吸引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1992年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高新区工作的暂行规定》，至2005年，成都高新区已吸引留学人员222人，这些具有高学历及外企工作背景的高级人才在成都高新区创办的在孵企业达184家，成为园区自主创新的重要主体。其次是通过地方财政增加创新资金供给，1997年以来成都高新区陆续建立了科技三项费、科技计划、战略性新型产品培育专项等一系列科技资金扶持政策，有力促进了科技型企业的起步和发展。另外，2004年成立的政府主管的成都高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对中小企业开展股权投资、投融资服务、战略发展、股权管理等科技金融业务，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步伐。

## 3 自下而上的全球化阶段:2005年以来

早在1990年代初，成都市政府便试图通过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把成都高新区建设为全市对外开放的“窗口”，推动其向外向转型。但空间上内陆的区位劣势以及时序上落后于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得成都高新区的全球化进程长期滞后，如

1999 年全区外贸出口额为 2020 万美元，仅相当于沿海地区的乡镇水平。直至 21 世纪初期以来，在全球生产网络加速重组、中国加入 WTO 等多重背景下，以最早的英特尔(2003)及随后的友尼森(2004)、宇芯(2004)、莫仕(2005)等大批知名跨国公司的集中入驻并在 2005 年左右形成产能为起点，成都高新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转型。又由于市场因素在此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因此区域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征。

3．1 跨国企业主导与全球化转型

跨国投资不断增多。2003 年，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宣布投资 3．75 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设立半导体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在产业生态系统尚且薄弱的情况下吸引到世界知名企业入驻迅速引发了众多跨国资本的关注，随后产生“蝴蝶效应”吸纳了大批集成电路设计、研发、芯片封装测试等上下游配套跨国企业到成都高新区办厂。如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迅速聚集了英特尔、友尼森、美国芯源、德州仪器等 100 多家 IC 企业，并吸引了莫仕、BOC、林德、梅塞尔、联华等众多配套企业。以电子信息产业为突破口，此后成都高新区跨国投资不断增加(表 3)，仅在 2009 年因受大地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

表 3　2006－2014 年成都高新区实际利用外资统计表

| 年份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
|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 6.51 | 9.08 | 12.29 | 7.97 | 9.02 | 11.97 | 16.15 | 21.18 | 21.40 |

注: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成都高新区统计年鉴》,表 4 同。

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受制于区位、改革等因素，成都高新区长期以来都未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仅有不多的跨国企业也多以占据当地市场为目的，导致出现上述提及的外贸水平长期滞后的问题。直至 2005 年以来，主要跨国公司将成都工厂定位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并将大量“成都造”商品供应至全球，成都高新区才开始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2001、2003 年国务院相继批准在成都高新区南区、西区建立出口加工区以及 2010 年批准建立综合保税区为园区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及空间载体保障。在此背景下，成都高新区外贸出口额整体增长强劲(表 4)，由 2006 年的 7．01 亿美元增加为 2014 年的 177．50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49．77%。以富士康的 ipad、英特尔的笔记本电脑芯片及处理器、德州仪器的半导体圆晶等产品为代表，少数跨国核心企业的“成都造”产品成为全球商品链的重要组分。

表 4　2006－2014 年成都高新区外贸出口额统计表

| 年份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
| 外贸出口额(亿美元) | 7.01 | 10.63 | 20.06 | 26.88 | 36.00 | 116.10 | 174.40 | 170.38 | 177.50 |

(3)少数核心跨国企业主导产业体系。英特尔的成功引进，使得成都高新区开始拥有真正具有产业支撑力的全球性企业。此后，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典型，跨国企业凭借其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在产业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逐步形成“国际企业主导+国内企业配套”的“领导型”企业网络。如集成电路产业方面，呈现出英特尔和德州仪器引领下的“双核驱动”发展态势，随着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加入，产业聚集度迅速提升，目前已形成一个由 IC 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及配套企业组成的完整产业链。软件产业方面，在 IBM 服务外包业务中心和美国新聚思中国研发中心的带动下，目前园区已集聚 6 家全球软件十强企业，从事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的企业达 1200 余家，成为国内重要的软件及服务外包基地。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产业缺乏具有产业领导力的跨国企业引领，受全球化影响较小。

3．2 全球化转型的价值链特征

借鉴已有对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的研究[28]，结合企业投入产出状况以及实地调研情况，对成都高新区核心跨国企业的价值链特征进行分析(图 2)。可以发现，成都高新区跨国企业总体处于以生产分工为主的较低价值链环节，即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中部的生产环节。同时由于成都高新区中后期以来定位于高端产业，对项目接纳设定了一定门槛，因此不少企业参与的是价值链制造环节中附加值尚且较高的高端产品制造环节，典型如英特尔、德州仪器、戴尔等。除高端产品制造，成都高新区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从事一般产品制造及代工生产的跨国企业，如莫仕连接器公司生产相对低端的电子连接器，2014 年产值 22．8 亿元。代工生产企业以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为典型，该基地已形成以鸿富锦公司为核心，睿志达、鑫成、业成等配套的大型代工生产基地，2014 年拥有员工十万余人，生产苹果平板电脑三千多万台，实现产值 732．2 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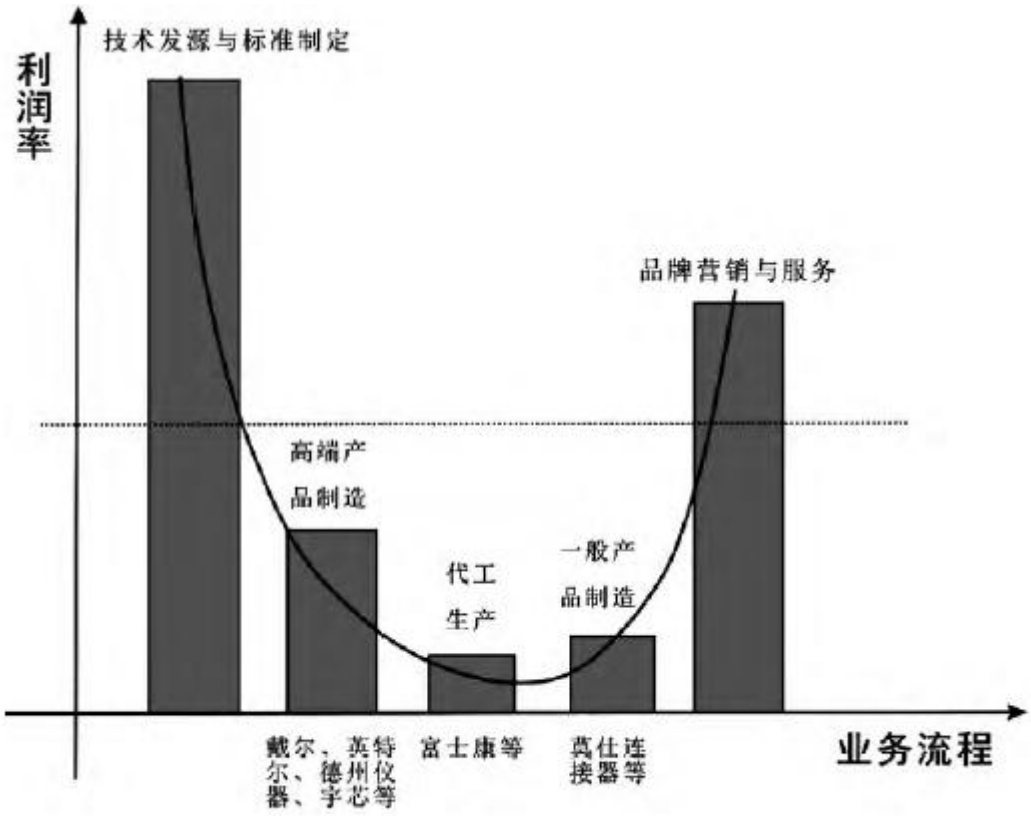


图 2　成都高新区主要跨国企业的价值链特征

3．3 全球化转型期的地方化配套

全球化是嵌入在地方经济和制度环境之中的，即地方独特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氛围对各种全球的商品、资金、信息、生产要素等各种“流”有黏着作用，因此在全球化转型阶段，地方依然是经济要素空间区位的重要基础[29]。在全球化转型期，成都高新区以地方企业以及地方政府为主体参与者的地方化力量积极参与、配合了园区的全球化转型。

(1)地方企业的配套。全球化转型期跨国公司在成都高新区设立生产及少量研发基地，并迅速建立以之为核心的“领导型”企业网络，而已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的本地企业则很好地补充了该网络。体现在:①消化产能。本地企业通过承接外包或代工业务来帮助消化跨国公司产能。②组建产业链。大批当地企业及国内迁移企业迅速以各自领域的跨国企业为核心，组建上下游配套产业链。③分享产业氛围。随着三大主导产业陆续形成国内甚至国际影响力，大批国内相关企业为分享良好的产业氛围入驻园区。

(2)地方政府的配套。以包括园区管委会在内的地方政府部门为主要决策者，始终在配合成都高新区的全球化转型。①早期阶段试图通过效仿新加坡等地开发区的外向发展模式来实现快速转型。②获得一定发展基础后，通过“尺度上推”寻求获得更高级别政权机构的“西部”特殊支持，典型如2006年成为全国6个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单位之一。③利用自身权限，通过“尺度下推”在区划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招商网络、优惠政策等方面实现经济秩序的自我强化。

## 4 全球化转型的脆弱性与一个未来新模式的探讨

4．1 全球化转型的脆弱性

2005年以后的全球化转型，成都高新区一方面持续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182．15亿元增加至2014年的1178．2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6．38%的高水准。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其经济增速已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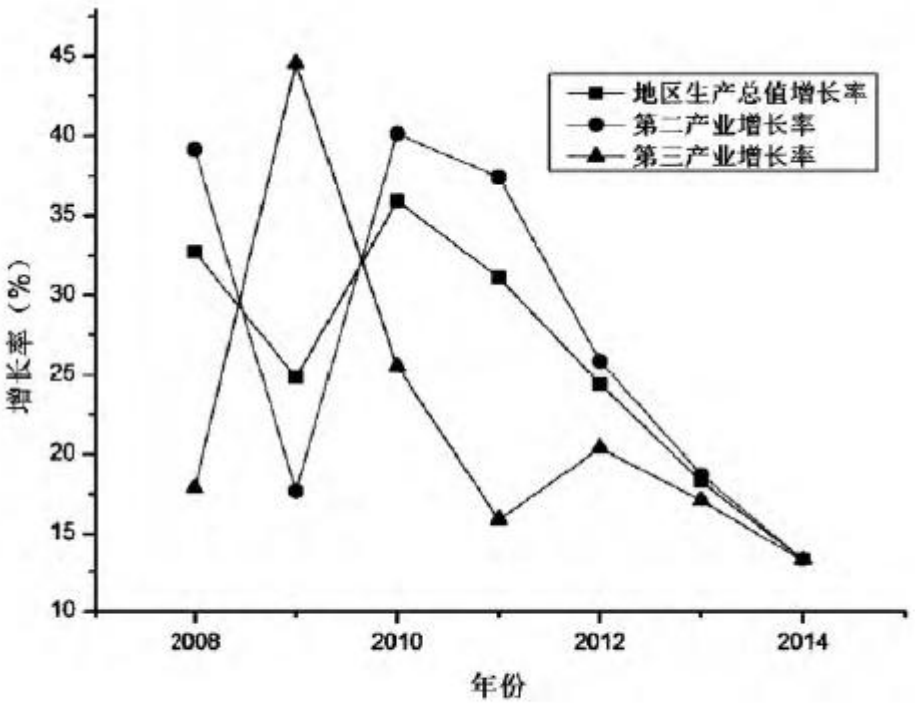


图3　金融危机后成都高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

注:数据计算自相应年份的《成都高新区统计年鉴》。

除受2008年大地震这一突发因素的影响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其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改变。首先，发达国家为全面调整其国内制造业而纷纷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进一步引发全球制造业的重构，也客观上导致成都高新区招商环境恶化甚至出现部分制造类跨国公司向本土回流，在调研走访中负责招商工作的投资服务局也肯定了这一不利因素;其次，全球经济下行引致的消费市场不振抑制了外向型企业的产能，如2014年三大旗舰企业英特尔、富士康、德州仪器产值分别下降了9．73%、3．17%、3．10%;再者，部分制造企业或制造环节出现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典型如成都富士康基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其已开始分散投资至东南亚，员工数由高峰时期的三十余万人下降至目前的不足十万。由此可见，成都高新区制造业目前实际上既面临发达国家从高端向中端延伸的竞争，也面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低端向中端发展的竞争。

除却后金融危机这一宏观背景，成都高新区长期以来以“要素补区位”、“政策补区位”的发展模式，其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并发也是另一潜在原因。结构性矛盾可能源于:首先，主导产业过于集中。自 1996 年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以来，成都高新区形成了长时期的三大产业主导的格局，大量国内外企业和新企业如潮涌之势集聚，而政府为之量身定制的产业生态环境则不断挤压了其余产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如服务业地位不断下降的怪像[①③]。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部分原主导产业的发展前景趋于黯淡，导致经济发展在面对危机时的回旋余地有限。其次，跨国企业过分处于主导地位。跨国企业的进入具有产业引领、知识溢出、塑造形象等多方面正向效应，但同时跨国企业在市场环境中展现出的全方位优势也将会一定程度上抑制本土企业的发展，导致本土企业长期处于“从属”和“追赶”的角色。实际上，以压缩成本或放大利润为目的的跨国企业，多数仅将其西部工厂作为全球生产和制造基地，也是继东欧及我国沿海地区后的再次区位替代，即使在面对危机时其仍有区位选择余地。扎根当地的本土企业应当负起更多的责任，但跨国企业过分主导下的本土企业在危机面前显然尚力不从心。第三，中低端价值链锁定。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对全球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构建内部价值链分工体系，将其产业链条中的部分工序转移至海外子公司。成都高新区的跨国企业虽多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但其转移的多仅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工序，如电子信息产业的封装测试、圆晶制造以及最终的产品组装等。另外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十分有限，造成产业发展的中低端价值链锁定，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4．2 一个双重驱动新模式的探讨

全球化转型以来定格于全球制造环节的成都高新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已显现出了各种新问题和新趋势，原有的发展方式、产业体系和技术选择模式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劣势和弊端已经加速显现，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因素下，既暴露了外向型经济的脆弱，也显现出本土经济的不足。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制度回归”举措，尤其是“三次创业”的开启对于将发展轨道引导至一个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驱动模式，即重塑地方发展模式起到关键性作用。

4．2．1 新的主导产业体系模式

根据《成都高新区“三次创业”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 年)》，成都高新区确立了“4+1”主导产业体系，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节能环保和生产性服务业。可见成都高新区的产业体系将伴随着多样化、升级化和本土化而发生转型。五大主导产业的确立将有利于化解长期存在的因主导产业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而从原有庞杂的主导产业中甄选出更高技术创新性的产业部门作为新的主导产业，如将电子信息产业替换为下一代信息服务产业，将精密机械制造产业替代为高端装备产业，则更好地契合了未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另外，节能环保及生产性服务业首次纳入到主导产业，从实际状况来看，这两大产业规模较小且未受全球企业的过多牵制，因此反映出的是地方政府正试图通过修正产业蓝图来培育本土产业和本土企业，以缓解外企过强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4．2．2 新的产业空间模式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培育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信息文化等现代“轻型”产业为主的新产业空间是大都市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按照“三次创业”产业空间规划，成都高新区将形成一个产业空间新模式，包括了大源和中和两大新产业空间组团(图 4)。新产业空间的兴起将缓解发展过度依赖跨国企业集聚的传统制造业空间，尤其是英特尔、TI、戴尔等所在的综合保税区。其中，大源组团用地面积约 20 平方千米，规划居住人口约 37 万人，包含了多个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大源商务商业区、国际会展中心、天府软件园区、金融后台服务园区，以及五个配套居住区。中和组团用地面积约 20 平方千米，规划居住人口约 35 万人。位于中和南组团的新川创新科技园作为“一号工程”载体，用地面积约 10 平方千米，将盯准公司总部和研发

[3] ①1996－2014 年，成都高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34．21%，占 GDP 比重由 42．69%增加为 75．94%;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为 23．43%，占 GDP 比重由 51．60%下降至 24．05%。

中心，大力发展创新型都市产业，打造国际化产业合作平台，主要包括综合性创新科技研发区、生物产业聚集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集区、高端装备和节能环保等产业培育区、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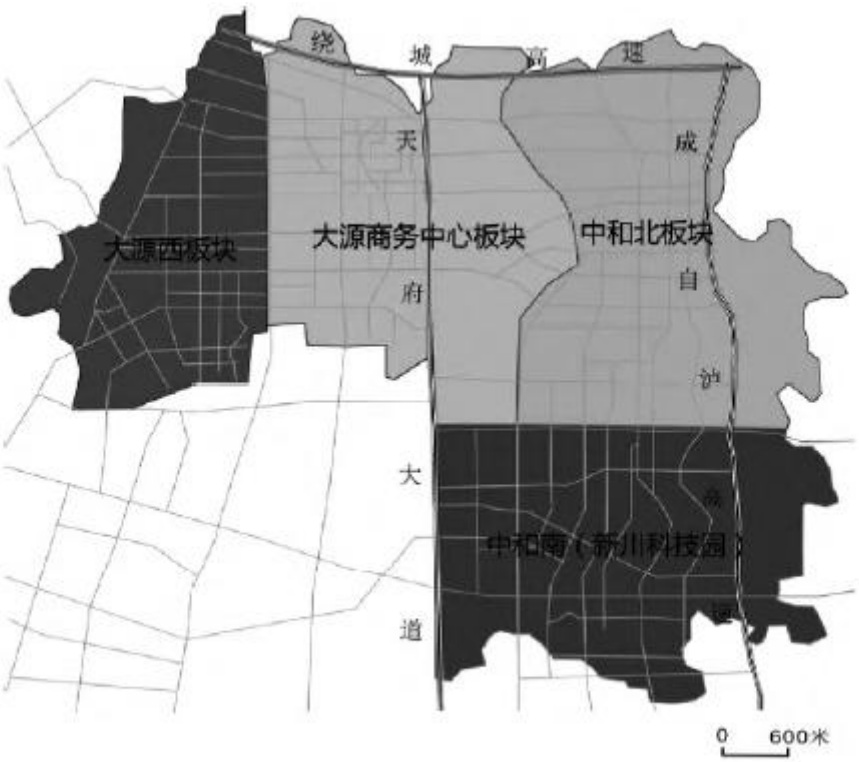


图4　成都高新区新产业空间规划图

来源：根据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提供资料绘制。

4．2．3 新的创新模式

在“三次创业”规划中，加强自主创新被摆在突出位置，反映出成都高新区正试图把经济发展进一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上来。首先，实施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工程，包括支持企业与本地科研院所展开研发合作，推进本土企业高水平研发机构建设及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支持跨国企业设立研发机构以促进国际先进技术的跨国转移等。其次，实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如引导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新型创新组织，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转移途径等。第三，实施科技金融创新工程，主要包括优化完善由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上市融资等构成的梯形融资服务体系，积极探索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和新模式。第四，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如加快培育和聚集符合技术创新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科技人才，并鼓励企业引进海内外高端管理人才等。

4．2．4 新的园区定位模式

早在 2008 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就作出全面推进成都高新区南区天府新城建设的决策，拉开成都高新区由传统产业区向综合新城转变的序幕。在其后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天府新城建设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天府新城被定位为成都未来的现代商务中心和高端产业新城，由此，其设立时作为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的定位已发生变化，开始向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新区转变，即由“产”向“城”的转变。其后，随着地下空间、综合交通系统、综合管廊系统、水系绿地链、特色街区等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天府新城已在行业总部、高端产业、商圈、文化休闲设施等方面形成一定集聚力。而近年来国家级新区———天府新

区的提出及落实为成都高新区的新城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在 2015 年国务院批复的《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中，成都未来将形成“一区双核六走廊”新格局，其中天府新城将作为“双核”之一，由此足以看出其在当地全域发展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 5 结论

地方化和全球化为研究区域发展转型路径提供了很好的复合视角。本文将成都高新区视为经典案例，对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成都高新区模式的形成是地方化和全球化相互渗透、相互配合的产物。文章尝试归纳出成都高新区完整的转型路径(图 5)，并得到以下三点主要结论:首先，1990 年代催生于政策环境的西部高新区，其发展动力最初来源于政府政策层面的渐进式供给，在此基础上以地方企业为主体的园区经济迅速活跃，形成一种相对“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其次，经济全球化的“西部”阻碍在 2005 年左右被打破，全球知名跨国企业的相继入驻使得西部开发区开始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但以寻求成本最低为根本目的的跨国企业“西进”，多数仅将其作为生产、制造基地，实际上也是继东欧及中国沿海地区后的再次区位替代。在这一阶段形成了相对复杂的市场力量为主、制度设计为辅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第三，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突发事件充分检验出过度依赖全球化经济的脆弱一面和本土经济尚且薄弱的一面，动荡的局势下如何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未来会不会出现跨国企业为寻求更低成本而再次转出的问题，值得思考并提前应对。成都高新区的做法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地方化力量的“回归”，将发展模式转向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驱动上，具体即借助“三次创业”将主导产业推向多样化、高端化、本地化，同时实现开发区由“产”向“城”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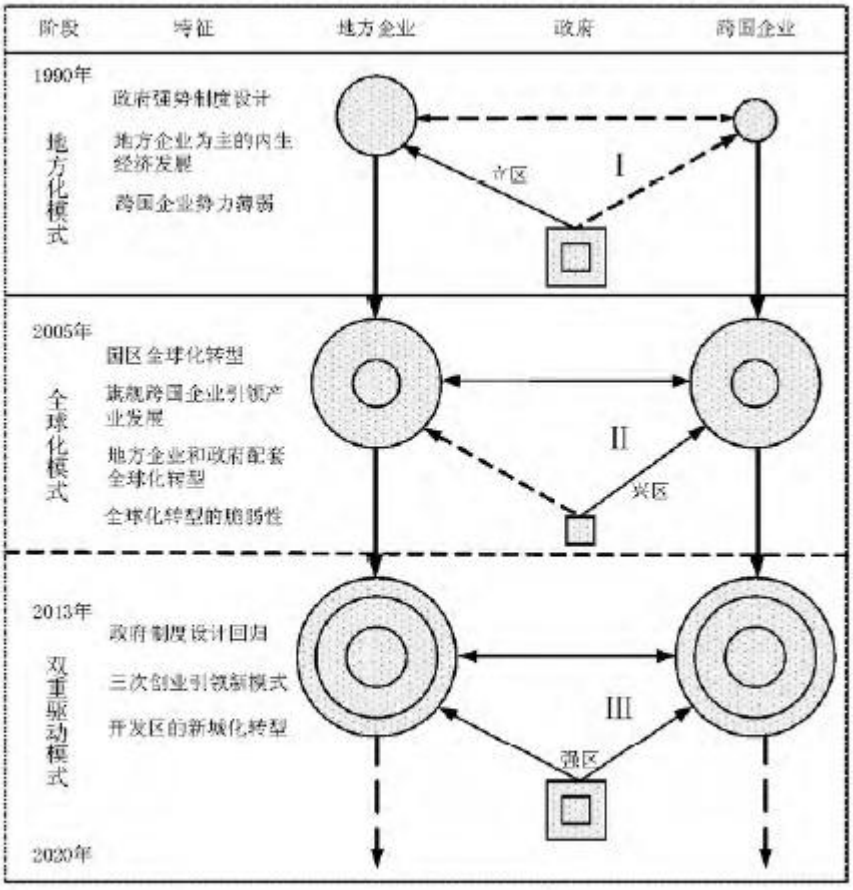


图 5　成都高新区的转型路径

在中国渐进制度变迁过程中，西部的开发区率先打开了政策的缺口，是西部地区地方化力量和全球化力量激烈交汇和博弈的场所，并日益成长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也引领着城市空间的重构。然而，城市是一个复杂多变系统[30](p1-2)，作为城市系统中高度活跃组分的开发区，其发展模式、路径则更为复杂。本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研究对西部发展关注的不足，扩大样本区范围及尺度以及关注开发区内部的复杂系统等还有待后续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 Adrian Smith， John Pickles，Milan Buce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 and differential upgrading in the European clothing industr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4，(14) .

[2] Weyland K. Neoliberal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9，31(4) .

[3] Mark Lorenzen，Ram Mudambi. Clusters，Connectivity and Catch — up: Bollywood and Bangalo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3，(13) .

[4]Dunford，M. Industrial districts，magic circl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talian textiles and clothing chain. Economic Geography，2006，(82) .

[5] 费孝通. 小城镇四记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6] 杨樱. 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与评价研究 [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7] 曾刚，尚勇敏，司月芳.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以中国 16 种典型模式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34(11) .

[8] Piore，M.， and Sabel，C.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9] Staber，U. Spatial proximity and firm survival in a declining industrial district [J]. Regional Studies，2001，(35) .

[10] Scott，A. New industrial spaces [M]. London: Pion. 1988.

[11] Coe，N. M. A hybrid agglomeration? [J]. Urban Studies， 2001，(38) .

[12] Whitford，J. The decline of a model? [J]. Economy and Society， 2001，(30) .

[13] Hadjimichalis，C. The end of Third Italy as we knew it? [J]. Antipode， 2006，( 38) .

[14] 许高峰，王炜. 论我国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作用: 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为例 [J]. 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6) .

[15] 应云进. 论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模式再创新: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看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演进 [J]. 企业经济, 2003, (5) .

[16] Amin, A. , Thrift, N. Neo — Marshallian nodes in global network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2, (16) .

[17] Coe, N. , Dicken, P. , Hess, M.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 .

[18] Glasmeier, A. Flexible districts, flexible regions? In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M].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刘云刚,叶清露. 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 对广东惠州发展历程的解读[J]. 地理科学, 2013, 33(9)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温州模式”的转型与发展———“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战略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219(6) .

[21] Yehua Dennis Wei, Wangming Li, Chunbin Wang. Restructuring Industrial Districts, Scaling Up Regional Development: A Study of the Wenzhou Model, China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83(4) .

[22]周元, 王维才. 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框架———兼论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能力评价 [J]. 经济地理, 2003, 23(4) .

[23] 赵建军, 李福华. 生态关系视角下国家高新区的演进机制与发展路径 [J]. 经济地理, 2003, 23(4) .

[24] 谢守红, 苏成真. 苏锡常高新区“二次创业”能力评价与提升对策 [J]. 城市问题, 2012, 201(4) .

[25] 陈汉欣. 新世纪中国高新区的新成就及其“二次创业”任务剖析 [J]. 经济地理, 2006, 26(4) .

[26] 王树海, 闫耀民. 国家高新区未来发展的对策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09, (3) .

[27] 杨永春. 中国模式: 渐进制度转型与地理空间演变 [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28] 李健, 宁越敏, 汪明峰. 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分析———兼论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J]. 地理学报, 2008, 63(4) .

[29] 贺灿飞, 毛熙彦.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9) .

[30] 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 城市地理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